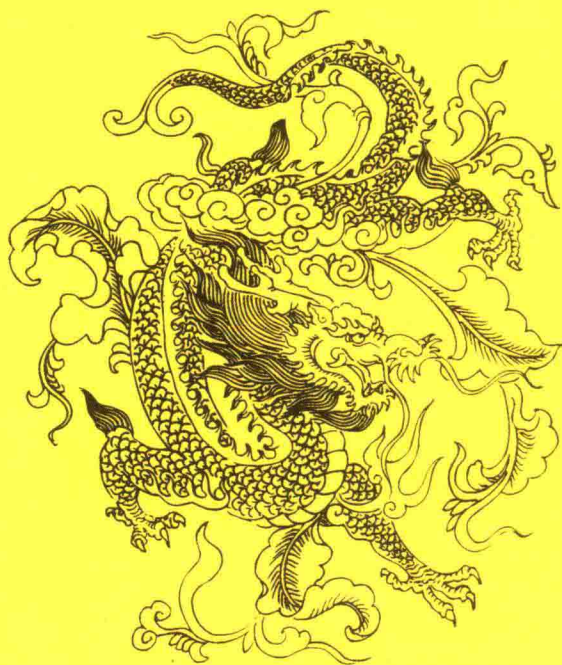


普通高等教育“十二五”规划教材

· 汉语言文学系列 ·

中国现代文学史

主编◎余芳 谌华



中国工商出版社

女朋友们

西班牙语短篇小说经典

[墨] 卡洛斯·富恩特斯 等著
吴健恒 编译



新 华 出 版 社

责任编辑 傅伟光
封面设计 可可工作室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现代文学史 / 余芳, 谌华主编. — 北京: 中国
工商出版社, 2013. 4

ISBN 978-7-80215-590-9

I. ①中… II. ①余… ②谌… III. ①中国文学—现
代文学史 IV. ①I209.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59527 号

书名/中国现代文学史
主编/余芳 谌华

出版·发行/中国工商出版社
经销/新华书店
印刷/北京明兴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张/17.5 字数/330 千
版本/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社址/北京市丰台区花乡育芳园东里 23 号(100070)
电话/(010)63730074,83610373 电子邮箱/zggscbs@163.com
出版声明/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书号:ISBN 978-7-80215-590-9/I.8
定价:38.00 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本社负责退换)

前 言

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三十年,是中国社会遭遇巨大变革的时期。中国的本土作家从自己的生活视角与艺术感受出发,创作出了大量鲜活的作品。作家本人的精神面貌和人格魅力也成为后世的楷模及精神营养。蔚为大观的文学作品和作家闪耀在这三十年。

已经有许多文人和学者及教育工作者将这段文学史整理并展现出来。本教材的编写初衷就是,在前人的文学评论著作和编撰的书籍中汲取精华,以更简练的方式梳理这三十年间的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为大专院校的学生或相关社会人士了解这段辉煌而复杂、出现了大量颇具艺术匠心的文学创造性实验作品,并承前启后的文学时代提供简明线索和直接帮助。

本教材以“1917—1949”为时间编年,以“三十年”为历史叙述方式,分列为三编:第一编——“五四”文学革命和第一个十年文学(1917—1927);第二编——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的文学(1928—1937年6月);第三编——第三个十年(1937—1949年9月)。以文学的时代背景与概貌;文学的时代精神及代表作家作品为主要体例结构方式,本教材共阐述了15章的内容。各编的章节分布因每个时期文学各自的特色和亮点不同,略微呈现出不同的样貌。

本教材在具体的阐述过程中,注重人文性和实用性的特点。在编写过程中,编者借鉴了许多前人成形的著作和教材的观点;同时,注重收集和采编当今有创造性的时论,结合多年的教学经验和个人感悟,力求给予读者一个清晰的时间概念和时代感觉,展示文学在时代社会背景下的成长历程和表达方式。

本教材主编为武汉职业技术学院余芳和谌华,副主编为武汉福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陈育斌、武汉市仪表电子学校的郭红、武汉软件工程职业学院的冯玫、武汉职业技术学院的刘绍君、陈陶和王春艳。

在教材的编写过程中,为了使学生能获得更客观、更独到的信息资料,编者查阅了多种著作和教材以及网络资料,我们都一一进行了罗列。在此,我们对编写本教材提供了文字帮助和信息支持的各位作者予以衷心 and 诚挚的感谢!

因为能力和水平的原因,本教材某些内容可能出现差错,敬请读者和相关专业人士给予批评和指正!

编者

2013年2月

目 录

第一编 第一个十年 (1917—1927)

第一章 文学革命与白话文学	(2)
第一节 晚清文学革新	(2)
第二节 “五四”文学革命	(4)
第三节 文学社团的成立	(6)
第四节 早期白话文学创作	(8)
第二章 第一个十年文学的时代精神	(11)
第一节 新文学意识的觉醒	(11)
第二节 “五四”文学革命的历史性突破	(12)
第三章 代表作家及其作品	(15)
第一节 多样探索的小说创作	(15)
第二节 现代散文的建立和发展	(31)
第三节 “五四”新诗运动	(39)
第四节 早期话剧运动与创作	(58)

第二编 第二个十年 (1928—1937年6月)

第一章 30年代文学思潮与运动	(70)
第一节 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	(70)
第二节 左翼文艺思潮与自由主义文艺思潮的论战	(75)
第三节 文学创作的潮流与趋向	(77)
第二章 小说概述	(80)
第一节 30年代小说创作概述	(80)
第二节 左翼小说	(82)
第三节 京派与海派小说	(88)
第三章 茅盾	(92)
第一节 生平和创作道路	(92)
第二节 《子夜》	(96)
第三节 短篇小说	(101)
第四章 巴金	(104)
第一节 巴金生平及创作道路	(104)



第二节	巴金前期小说创作与《家》	(107)
第三节	巴金后期小说创作与《寒夜》	(110)
第五章	老舍	(113)
第一节	生平和创作道路	(113)
第二节	老舍笔下的“市民世界”	(115)
第三节	老舍的京味小说	(120)
第六章	沈从文	(123)
第一节	生平和创作道路	(123)
第二节	沈从文的“两个世界”	(124)
第七章	戏剧概述	(131)
第一节	第二个十年间的戏剧创作	(131)
第二节	代表作家——曹禺	(136)
第八章	诗歌	(141)
第一节	30年代诗歌概述	(141)
第二节	现代派诗人戴望舒与“汉园三诗人”诗歌	(147)
第九章	散文	(156)
第一节	30年代散文概述	(156)
第二节	各流派代表散文创作	(157)

第三编 第三个十年

(1937—1949年9月)

第一章	文学发展的概貌	(168)
第一节	抗战初期的文学时代背景和思潮	(168)
第二节	国统区内的文学时代背景和思潮	(171)
第三节	解放区内的文学时代背景和思潮	(174)
第四节	上海孤岛及沦陷区内的文学时代背景和思潮	(179)
第二章	文学发展的时代精神	(181)
第一节	抗日救亡与“抗战八股”	(181)
第二节	民族危亡与“战国策”	(182)
第三节	文艺创造与“主观精神”	(183)
第四节	大众文化与“民族形式”	(185)
第五节	文艺独立与“政治立场”	(186)
第三章	代表作家及作品	(189)
第一节	小说(一)	(189)
第二节	小说(二)	(217)
第三节	诗歌	(233)
第四节	现代戏剧的多元竞妍	(252)
第五节	记录时代风云的散文	(262)
参考文献		(274)

第一编 第一个十年
(1917—1927)



第一章 文学革命与白话文学

第一节 晚清文学革新

中国传统文学发展到晚清,已经出现了变化的苗头。清王朝的统治,经过“康乾盛世”后,显露了由盛转衰的迹象。1840年的鸦片战争成为民族危机的导火线,它后来又把中国带入到灾难深重的甲午战争中。随着甲午战败,列强企图瓜分中国,国家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软弱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与现实情势使得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一直在苦苦寻索富国强民的道路。“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推动了翻译西方书籍、派学生出国留学的文化热潮。效法西方搞君主立宪的戊戌变法失败,促使近代政治改革的领袖梁启超意识到了国民素质对于政治革新的重要意义。于是,他从“新民”的角度思考社会的变革,强调“新民”是当时中国的第一要务。“新民”之义,以为“欲维新吾国,当先维新吾民”。梁启超为了推进他的“新民”工程,要借重文学的力量。1899年12月,他在流亡途中提出“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充分肯定黄遵宪“我手写吾口,古岂能拘牵”的诗歌革新主张,其目的是要使中国诗词从晚清的拟古风气中摆脱出来,向与民生接近的方向发展。他提出,真正的“诗界革命”,“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三天后,梁启超在由日赴美的轮船上读了随身携带的日本政论家德富苏峰的著作,深受启发。他在《夏威夷游记》中写道:“读德富苏峰所著《将来之日本》及《国民丛书》数种。德富氏为日本三大新闻主笔之一,其文雄放隽快,善以欧西文思入日本文,实为文界别开一生面者,余甚爱之。中国若有文界革命,当亦不可不起点于是也。”梁启超发出“文界革命”的呼吁,意图是通过输入新词语打破已趋僵化的桐城派古文的藩篱,推广平易畅达、笔端含情的“新文体”。光绪二十八年十月(1902年11月),《新小说》杂志在日本横滨创刊,近代的“小说界革命”公开亮相,梁启超在《新小说》创刊号上发表了著名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提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故欲新道德,必先新小说;欲新宗教,必先新小说;欲新政治,必先新小说;欲新风俗,必先新小说;欲新学艺,必先新小说;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先新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他认为小说有“薰”、“浸”、“刺”、“提”四种力,用艺术形象来感染读者,对人心的影响超过其他文体。以梁

启超在文坛的地位,他的小说观对中国传统以诗文为正宗的文学观造成了重大冲击,直接推动了晚清小说创作高潮的到来。

甲午战争失败后,知识界在对现实的深入反省中,开始进一步将目光转向教育与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在普及教育、开通民智的思想要求之下,白话语言的推行问题已被提了出来。1887年5月,黄遵宪最后完成了全面记述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社会政治和文化变迁的《日本国志》的纂述,书中正式提出了言文合一的主张,他要求“变一文体为适用、通行于俗者乎”,“欲令天下之农工商贾妇女幼稚皆能通文字之用”。梁启超在其所拟的变法纲领《变法通议》中称:“古人文字与语言合,今人文字与语言离,其利病既屡言之矣。”足见当时对言文分离问题的重视已相当普遍。1898年8月,戊戌变法的领袖之一、近代白话文运动的前驱裘廷梁在《中国官音白话报》上发表了二千五百余字的著名论文《论白话为维新之本》,提出“愚天下之具,莫如文言,智天下之具,莫如白话……文言兴而后实学业废,白话行而后实学兴;实学不兴,是谓无民”。裘文高张“崇白话废文言”的大旗,将文言与白话植入了二元对立的格局。一年以后,另一位白话文的先驱陈荣衮也发表了《论报章宜改用浅说》一文,明确主张报纸改用白话,他说:“大抵变法,以开通民智为先,开民智莫如改革文言。作报论者,亦惟以浅说为输入文明可矣。”推行白话的主张,得到了新闻界的响应,一批白话报纸陆续创刊。晚清十余年间,各地创办的白话报刊达140余种,影响较大的有《无锡白话报》、《杭州白话报》、《中国白话报》、《安徽俗话报》、《直隶白话报》、《京话日报》等,其中又以陈独秀创办的《安徽俗话报》最具代表性。白话报的创办和发展,扩大了白话在社会上的影响,形成了一种白话氛围,全国各地创办白话报成为时代风尚,这些都为“五四”时期在更高层次上开展白话文运动,创造了社会条件,培植了舆论空间。

专门登载小说的数十种小说杂志,此时也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如梁启超创办的《新小说》(1902)、李伯元主编的《绣像小说》(1903)、吴趼人编辑的《月月小说》(1906)、曾朴编辑的《小说林》(1907)便被称为当时的“晚清四大小说杂志”。科举制的废除和现代教育的出现,一方面为现代的新文学准备了大量新式读者,另一方面也驱使那些脱出了传统“学而优则仕”人生轨道的被不断边缘化的知识分子投身于文学事业,把文学作为职业。晚清不仅出现了一大批职业作家,而且中国文学特别是小说呈现出空前繁荣。据阿英编《晚清戏曲小说书目》统计,1898年到1911年14年间出版的小说,达1145种(包括未完之作),比此前250年出版的总数还要多。梁启超肯定小说的不无夸张的名言“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很快便成为时代的共识,并推动着“新小说”走向繁荣。随着梁启超1902年在日本横滨首先创办小说刊物《新小说》之后,《绣像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小说世界》、《中外小说林》等多种专门性小说刊物蜂起,到1918年徐枕亚创办《小说季报》,仅小说期刊就达50种以上,有力地促进了小说的创作与传播。

晚清文学变化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王国维在中国首次提出了超功利的文学观,王国维早年接受叔本华等人的现代西方哲学思想,开始用西方美学理念来研究文学。他尖锐批评梁启超等人把文学当作改良社会工具的文学观,认为美就是“纯粹无欲之我”在“静观中所得之实念”,



强调“一切之美，皆形式之美”。这种超功利的美学思想，是对中国传统诗教的一大挑战，也是对20世纪初梁启超工具论文学观的一次重要的超越，其意义在于把文学引向了美自身的价值。王国维开创了中国现代学术的先河，其超功利的美学观和“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进化论文学观，对于“五四”文学革命具有重要的影响。

随着现代都市社会的发展和市民阶层的扩大，民国初年以上海为中心出现了以消闲与消遣为主要目的的小说创作潮流。当然，为了适应民初社会价值空缺和迷茫的时代现实以及市民多样化的文化选择，这时期的小说带有明显的通俗化特征，存在着格调不高、迎合世俗，甚至媚俗与商品化的倾向，追求消闲与娱乐，艺术上带有模式化、类型化的特点。不过一些优秀的开风气之先的作品却传达了一种黎明前夕的青春气息，表现了一种文学思潮的转移。例如苏曼殊的《断鸿零雁记》细腻地展示了主人公(三郎)徘徊在理性与情感、宗教戒律与世俗人生、出世与入世之间的矛盾与困惑。虽然他为了成全雪梅而出家，却又始终忘不了她；虽然他拒绝了静子的爱情而坚守和尚的身份，却在感情上充满了惆怅与痛苦。“他似乎在寻求超越爱与死的本体真如世界，而这个本体真如却又实际只存在于这个世俗的情爱生死之中。”这种矛盾和困惑传达出来的正是一个已经觉醒但又不无迷茫与痛苦的心灵世界，这是只有“近现代人才具有的那种个体主义的人生孤独感与宇宙苍茫感”。苏曼殊之所以能率先传达出这样清新的艺术信息，是与他多年在海外汲取欧风美雨，特别是他受以拜伦为代表的西方浪漫主义呼号个体独立的“思想情感方式”的浸润分不开的。它标志着现代个体主义的文化精神开始在中国大地上萌动。相对于晚清小说来说，民初小说在艺术变革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不仅各种体式的探索异彩纷呈，同时小说语体的正反经验也推动着作家逐渐意识到“小说以白话为正宗”，并率先于1916年推出了“全用白话体”的小说月刊《小说画报》(包天笑主编)，开了白话文学运动之先声。而话剧这种舶来的艺术样式，也以“文明戏”的新形式在中国的沿海都市流行起来。

第二节 “五四”文学革命

“五四”文学革命是伴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一起产生的。辛亥革命后，政治黑暗依旧。中国近代社会民族危机不断加深，社会阶级矛盾日渐激化。一批进步的近代知识分子，为了挽救民族危机，在中国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他们大力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向禁锢人们思想的封建旧道德、旧文化发起猛烈进攻，最终发展为声势浩大的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最初以1915年9月5日创刊的《新青年》(第一卷原名《青年杂志》)为阵地，以陈独秀、李大钊、吴虞等为主要撰稿人，掀起一场思想启蒙运动。主编陈独秀(1880—1942)，字仲甫，安徽怀宁人，出身书香门第，17岁参加县考中秀才，但厌恶八股，醉心于新学而东渡日本。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上发表的《敬告青年》一文中指出：“吾国欲脱蒙昧时代……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这实际上树起



了整个“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帜：民主与科学。并进而把宣传西方民主政治、科学知识与反封建礼教和封建迷信紧密结合在一起，以促进国人的思想解放。然而，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封建文学和僵死的文言文，已成为提倡新道德、传播新思想的严重障碍。由此，一场以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内容的文学革命运动爆发了。

《新青年》于1917年因陈独秀受聘北京大学文科学长而迁往北京，并从1918年1月起改由陈独秀、李大钊、胡适、刘半农、沈尹默、钱玄同等轮流编辑，周作人、鲁迅也给该刊写稿，由此形成了反封建的思想文化战线。当时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大大推进了新思想在北大的传播，新文化运动也就借北大学术自由的空气获得了迅猛发展。

最早倡导文学革命的是胡适和陈独秀。胡适早在留美期间就同人议论过中国文字和文学的改革。1917年1月在《新青年》上公开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一文。文中提出改良文学应从“八事”入手，即须言之有物、不模仿古人、须讲求文法、不作无病之呻吟、务去滥调套语、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字俗语。此“八事”侧重文学语言文字的改良，也强调了文学内容的充实，可谓近代白话文运动在新时代的发展。同年2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学革命论》以声援胡适的文学改良主张。文中大书特书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陈独秀表现出了比胡适更为激进的态度，并且更多地关心文学内容的革新。

继胡适、陈独秀之后，钱玄同、刘半农等先后加入了文学革命的阵营。钱玄同以语文学家的身份对中国旧文学和积淀着封建毒素的汉语言文字进行了猛烈的讨伐，他站在进化论的立场上阐明白话文取代文言文势在必行。刘半农则就白话的采用和中国文章体制的变革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五四白话文运动吹响了现代语言革新的号角，白话文的影响借着新文化运动的声威与日俱增。

1918年4月，胡适又发表了《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对文学革命的宗旨做了新的阐释。他的宗旨，就是通过“国语的文学”来建设“文学的国语”，将文学革命与国语运动结合起来，以收彼此促进的成效。同年12月，周作人发表《人的文学》，提出新文学即是人的文学，从而有力地把握了新文化运动的启蒙精神落实到了文学中，使文学革命有了更为具体的目标。1918年冬，陈独秀、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北京大学学生傅斯年、罗家伦等办了《新潮》月刊。这些刊物提倡白话文和新文学，努力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介绍外国文学思潮，文学革命的声势越来越大。

文学革命向纵深推进最突出的表现是广泛地吸收外来的思想资源，引进和借鉴外国文学的经验，推动了新思潮的涌现。周作人的《人的文学》为新文学确立了人道主义的原则，他所提倡的“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与西方的人道主义精神一致。李大钊对文学的理解，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俄国现实主义文学观的影响。《新青年》先后译介了屠格涅夫、王尔德、契诃夫等众多的外国作家的作品，还发行了一期《易卜生专号》，发表易卜生的《娜拉》、《国民公敌》等三



篇剧作,引发了一场演易卜生的戏、讨论易卜生的问题的“易卜生热”。《少年中国》、《小说月报》、《文学周报》等刊物也大量登载了翻译作品。短短的几年间,这些刊物把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的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现实主义、象征主义、唯美主义、印象主义、未来主义、立体主义、心理分析派以及人道主义、实证主义、尼采哲学、弗洛伊德主义、托尔斯泰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马克思主义等文学思潮和哲学思潮大都介绍进了中国。外来的思潮激发了中国本土的文学创作力量,许多文学青年从西方文学中汲取营养,探讨人生的问题,表达内心的苦闷,从而形成了五四文学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双峰并峙、现代主义因素渗透其间的独特景观。

在文学革命运动的展开过程中,新与旧、激进与保守的交锋构成了一个重要内容。可以说,文学和思想的论战始终没有停歇过。其中出于文学观念的根本对立而发生的两军对垒,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成为新文学捍卫自身合法性的一项重要任务。新文化运动伊始,林纾作为晚清的古文家和颇有影响的翻译家,率先起而反对白话文。他在《致蔡鹤卿太史书》中对新文化运动的思想、行为予以攻击,称之“尽反常轨,侈为不经之谈”。但在当时的时代环境下,这一反对声音很快在新文化阵营的合力夹击下销声匿迹。1921年9月,南京东南大学的梅光迪、胡先骕、吴宓等人创办《学衡》杂志,以“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为旗帜,对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激进倾向提出了批评。与林纾有所不同,这些教授都曾留学美国,了解西洋文明。他们在实现中国文化和文学革新方面持循序渐进的文化守成主义立场,反对激进的变革。梅光迪发表《评提倡新文化者》,吴宓写了《论新文化运动》,吴先骕撰《评〈尝试集〉》,对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进行了系统的批评。这些意见触及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一些偏激方面,并非全无道理。但总的看,他们否认历史发生转折的可能,站到了守旧的立场上,成了历史前进的阻力。对此,新文化和新文学的倡导者纷纷发表文章加以驳斥。鲁迅发表《估学衡》一文,指出这些教授所写的文言文理不通,只能说明文言的气绝罢了。1925年,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兼司法总长章士钊在刚复刊的《甲寅》周刊上发表《评新文学运动》等文章,力图证明白话文不能取代文言文。他说:“吾之国性群德,悉存文言,国苟不亡,理不可弃”,断定白话文已成强弩之末,当务之急则是提倡“尊孔读经”。新文学阵营撰写文章,全力反击“甲寅派”的复古观念。

新文学运动在与守旧派的思想较量中不断地拓展自己的阵地,虽然在激烈的论辩中难免有些过激的言论,有时不能冷静地思考对立面意见的某种合理性,但也正是这种冲决一切的气势扩大了文学革命的影响。

五 第三节 文学社团的成立

进入20世纪20年代,新文学的影响和实践范围进一步拓展,其中一个最明显的标志就是新文学倡导时期的泛泛的思想和文化宣传转化为具体而专门的文学实践。据统计,1921年至



1925年全国先后出版的文学刊物有300多种,文学社团100多个。这些文学社团的成员多为青年学生、教师和职员,他们的政治观点、思想倾向和后来的发展趋向虽然不尽相同,活动时间的长短和影响大小不一,但总的来说,对“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深入和发展仍然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在众多的新文学社团中,影响最大的是文学研究会、创造社、语丝社和新月社。

一、文学研究会

文学研究会是最早成立的大型文学社团。1921年1月在北京成立。发起人有周作人、朱希祖、蒋百里、郑振铎、耿济之、瞿世英、郭绍虞、孙伏园、沈雁冰、叶绍钧、许地山、王统照等12人。他们的刊物有《小说月报》、《文学旬刊》、《诗》月刊等。曾编辑出版过《文学研究会丛书》近百种,收该会成员的翻译和创作的作品。该会以“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为宗旨,倡导“写实主义”文学精神,在创作方法上提倡现实主义、强调对客观社会现实作具体的观察、严格的选材和客观、真实、细致的描写,以反映现实人生的本相,进而达到文学为人生的目的。文研会的大多数成员本着这一原则进行文学创作:他们立足于社会现实人生,创作了大量以知识分子和劳动人民为广泛生活题材的作品,以及一些探索和思考现实人生的“问题小说”,表现了作者严谨的创作态度、朴实、自然、细密的写实风格。叶圣陶、王统照、王鲁彦、朱自清等就是这些人的代表。

文学研究会除努力创作外,也十分重视外国文学的介绍、翻译和研究,他们着重译介俄国、法国及北欧等国暴露社会黑暗,反映被压迫民族、弱小民族命运的现实主义名著,如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契诃夫、罗曼·罗兰、莫泊桑等作家的作品,作为中国新文学创作的借鉴,为新文学的建立和发展作了很大的贡献。

二、创造社

被称为“异军突起”的创造社于1921年6月成立于日本东京。其成员是当时的留日学生,以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为核心,包括张资平、田汉、郑伯奇等。创造社成立后,先在上海出版《创造社丛书》,次年又创办《创造季刊》为其机关刊物,接着先后出版了《创造周报》、《创造日》、《洪水》、《创造月刊》、《文化批判》等10余种刊物。

创造社从文艺思想到创作倾向都是以浪漫主义为其特点的。他们初期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强调文学必须忠实地表现作者自己的“内心的要求”,讲求文学的“全”与“美”,推崇文学创作的“直觉”与“灵感”,重视文学的美感作用。但他们又同时注重文学表现“时代的使命”,对旧社会“不惜加以猛烈的炮火”。因此,创造社初期的文艺思想比较含混而充满矛盾,这反映出当时一些具有革命要求而意识上仍然朦胧的小资产阶级知识青年的思想特点。

创造社有与文学研究会不同的创作风格。他们反对封建专制,蔑视一切旧传统,暴露封建



礼教的罪恶,富有强烈的革命精神,但强调展示内心世界、侧重表现自我,并不注重于对现实的客观描绘,因而不论是诗歌、散文、小说和戏剧,主观抒情色彩都较为浓厚,或表现为一泻千里式的直抒胸臆,或表现为大胆的诅咒和歇斯底里式的狂叫,或表现为坦率的自我暴露,抒写浓重的哀痛苦闷,甚至流露出伤感、颓废的情绪。

三、语丝社

语丝社于1924年成立于北京,因出版《语丝》周刊而得名,是当时具有进步倾向的文艺性周刊,登载的大都是散文和杂文,内容注重社会批评和文化思想批评,形成一种风格泼辣、幽默的“语丝文体”,主要成员有周作人、钱玄同、林语堂、刘半农、孙伏园等。语丝社成员的思想倾向、文艺主张虽不尽相同,但《语丝》在散文创作方面自然形成独特风格。1927年10月以后,《语丝》由北京移到上海出版,从第4卷第1期起由鲁迅后又转由柔石再转由李小峰编辑。这时《语丝》已每况愈下,逐渐失掉先前的战斗特色而“消沉下去”,终于在1930年3月出至第6卷第52期时停刊。

四、新月社

新月社于1923年在北京成立,主要成员是闻一多、徐志摩、陈源、梁实秋等,多为英美留学生。他们深受西方唯美主义思潮影响,在理论上强调艺术美的至高无上,提倡建立一种“纯粹的艺术”,要求文艺“解脱自然的桎梏”,而去接受艺术格律的束缚,“乐意戴着脚镣跳舞”。具体到新诗方面,主张新诗应具有“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辞藻)、“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和句的均齐)。在这一理论影响下,他们的创作具有章法谨严、句式整齐、语言凝练、意象新颖、意境深邃等特点。他们汲取我国传统诗词的营养,借鉴外国诗的技巧,在力图建立合乎中国传统欣赏习惯的民族化新诗方面所作的尝试,为新诗的发展作出了不容忽视的贡献。

当时出现于中国文坛并产生较大影响的文学社团还有湖畔诗社、弥洒社、浅草社、南国社、莽原社、未名社、狂飙社、民众戏剧社等。文学社团的大量涌现,给“五四”新文学带来了蓬勃的生机,大大促进了新文学的发展。

第四节 早期白话文学创作

文学革命初期所遇到的最大挑战,是白话文如何取代文言文,尤其是能不能用白话文写出优秀的诗歌来。在初期白话诗的实践,胡适既是一个积极的倡导者,也是恪尽全力的实践者和先行者。胡适在发表《文学改良刍议》之前,已经开始思考诗歌采用白话写作的问题。在留美时与同学梅光迪等人交换意见,他就提出要使白话文能够通行,必须用白话写新诗。这样做的



目的,是打破诗词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他在《论新诗》中提出,必须“推翻词调曲谱的种种束缚;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后来他又把这一主张概括为“作诗如作文”,强调诗歌语言要近于说话,反对“镂琢粉饰的诗”。这与他在《文学改良刍议》中主张不用典、不讲对仗、不避俗语俗字的观点是一致的。为了保证白话新诗不致失去诗的素质,胡适又提出用“自然的音节”取代旧诗词的格律,用口语的语法取代文言的语法,并吸收外国的新语法。这样做的结果,是新诗走向散文化,并由此建立起了一套新的诗歌美学。

胡适在进行新诗理论探索的同时,开始了新诗创作,1917年,他在《新青年》4卷1号上发表了《鸽子》,同时发表的有刘半农的《相隔一层纸》、沈尹默的《月夜》等。到1920年,他把创作的新诗加以筛选,出版了《尝试集》,这是最早出版的一部新诗集。胡适对于新诗有首创之功,他的新诗实践和理论建构既提供了白话新诗的最初形态,也表达了相应的诗歌观念,这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两个方面:一是崇尚自然与平实的风格;二是用托物寄兴的手法让诗去表达高深曲折的理想。前者的后果表现为早期白话诗创作中反映人生疾苦的写实之作的大量出现,如胡适的《人力车夫》、刘半农的《相隔一层纸》、周作人的《两个扫雪的人》、朱自清的《小舱里的现代》等。胡适的《鸽子》、《老鸦》,周作人的《小河》等则代表了后者这种诗歌观念支配下的诗歌实践。

不过,从总体看,胡适的新诗带有初创期的局限,艺术成就不高。他一方面要挣脱旧诗词的格律,努力采用白话的文字、白话的文法和白话的自然音节;另一方面,已经养成的作旧体诗的习惯不可能在短短几年就彻底打破,所以他的新诗语言是日常的口语,而调子却有旧诗词的成分。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的新诗是从旧式诗词曲调里脱胎出来的。由于竭力用口语写诗,他的一些诗做到了通俗易懂,然而也带来了过于直白、诗味不浓的缺点。

沈尹默、刘半农、俞平伯、康白情和傅斯年等早期白话诗人也像胡适一样,是“从旧式诗词里脱胎出来”的。沈尹默的《三弦》、《月夜》是早期白话诗的代表作。俞平伯的《冬夜》和康白情的《草儿》两诗集也在白话诗的初期创作中产生了重要影响。真正摆脱了旧诗词的束缚而又内涵丰富、具有诗性美的是周作人的《小河》。《小河》写一条自然流淌的小河被农夫筑堤拦腰截断,升高的水位使小河变得焦躁,也让下游两岸的小草和树木担忧河水决堤会带来灾难,所表达的是尊重自然人性的现代思想。艺术上,它着眼于小河形象的描写,用流畅的口语写出,避免说理,因而诗意浓郁,被胡适推荐为“新诗中的第一首杰作”。

在小说创作方面最初显示了白话文学实绩的是鲁迅的创作。1918年5月发表于《新青年》4卷5号的《狂人日记》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具有现代形式和现代精神的白话小说。继《狂人日记》之后,鲁迅又陆续发表了《孔乙己》、《路》等短篇作品以及中篇小说《阿Q正传》。这些作品在为现代白话小说进一步赢得了荣誉的同时,也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创作确立了典范。在鲁迅的影响和带动下,先后涌现了汪敬熙、罗家伦、杨振声、叶圣陶、冰心、俞平伯等一批年轻的小说作者。这些年轻作者以新文化运动所传播的启蒙思想作为观照社会、人生的主要资源,大胆地用小说探讨社会、人生诸问题,迅速形成了一个“问题小说”的创作热潮。汪敬熙的



《一个勤劳的学生》，罗家伦的《是爱情还是痛苦》，杨振声的《渔家》、《贞女》，冰心的《谁之罪》、《斯人独憔悴》，俞平伯的《花匠》，以及叶圣陶的《伊和他》等，都不同程度地触及了各种社会问题，形成了“问题小说”的最初的观念和创作风格。1921年文学研究会的成立，更将“问题小说”的创作推向了高潮。

1921年，周作人在《美文》中探讨了介于诗与小说两大文类之间的一种写作可能，并从此开始新文学对散文的理论建设。1918年4月，《新青年》4卷4号开辟了“随感录”专栏，为现代散文的创作提供了最初的园地。随后，《每周评论》、《新生活》、《新社会》，以及《晨报》、《民国日报》等众多报刊也都相继开设了“随感录”、“浪漫谈”、“杂感”等性质相类的栏目。这些栏目的开设对初期散文形态起了重要的作用。在初期白话散文的众多实践者中，《新青年》的“随感录”以其写作者的群体优势为中国现代散文传统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其中，鲁迅的“随感录”写作开创了现代散文中绵延数十年而且成果丰硕的“杂文”、“小品”谱系。除鲁迅之外，李大钊、陈独秀、钱玄同、周作人、刘半农等人的“随感录”写作也都以各自的特色显示了白话散文写作的丰富性和可能性。

与诗歌、散文和小说相比，新文学初期的戏剧创作则略显贫弱，在挣脱传统旧戏、建立现代戏剧观念的艰难过程中，虽然也产生了胡适的《终身大事》、郭沫若的诗剧《棠棣之花》等创作，但在现代戏剧传统中的意义并非十分重大，真正对中国现代剧产生决定性影响的作家和作品是在1922年以后才出现的。



第二章 第一个十年文学的时代精神

第一节 新文学意识的觉醒

从根本上讲,中国新文学是在东西方文化大交流、大碰撞的背景下产生并发展起来的。但新文学意识的真正觉醒却经历过一个曲折的过程。

新文学意识,就其本质而言,指的是文学内容方面的人的意识和个性意识,文学形式方面的白话意识和新文体意识。新文学的这一内核恰恰体现出与中国正统文学精神的反叛。新文学意识就是在西方文学意识对中国传统文学的不断冲击、刺激下,经由中国传统文学母体内部孕育、变异而最终走向成熟的。

漫长的封建社会直接培育了以“载道”为价值取向的中国正统文学。它的最高审美原则是以压抑人的天性使之合于封建人伦的“中和之美”。但随着明朝中叶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这种正统文学观已受到某种挑战,从李贽的攻击封建文学的禁灭人欲,到公安派文人提倡“性灵说”,再到清人王夫之、顾炎武从民主思想出发倡导的“文须有益于天下”,标示着中国传统文学内部已经孕生着一种呼唤“个性”和“社会性”的新文学自觉意识的萌芽。这种萌芽到了1898年戊戌变法前后,由于受林纾等人大量评介西方文学名著,即全新异质的西方文学影响,找到了进一步生长——对封建文学进行革命的新的契机。在戊戌变法以及“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白话文运动”的主要组织者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等人的身上,兼有思想启蒙与文学启蒙的双重色彩。可举为用思想启蒙的巨大车轮带动文学启蒙典范的,应推梁启超写于1901年的《新民说》和另一篇重要文章《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梁启超参照西方文学理论,提出了“纯功利”文学观,他从政治改良出发,将小说这一文体提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提出“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开始”。尽管这种“小说治国论”并未彻底摆脱传统文学的“载道”模式,但对于提高小说文体的地位、推动近代文学观的进化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梁启超的突出贡献在于,他把新文学置于政治、道德、宗教、人心、风俗和人格变革等社会改革的广阔背景当中,将其提到了挽救民族危亡的历史高度。

与梁启超“纯功利”文学观相反的,是王国维在中国首次提出的“超利害”文学观,这可以说